

决当前文艺中存在的复杂问题,是一项迫切的工作。

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文艺理论领域的专家,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你们的到来,不仅会为这次学术研讨会增加思想的光彩与学术的分量,更重要的是,能够为当代文学艺术理论与创作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主张。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转折点,其三十年的理论与实践值得我们认真地回顾与总结。

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是思想解放。“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因此,以一种面向未来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文艺创作和批评、理论的发展历史,认真研究今天文艺面临的各种问题,确立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文艺的当代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为作者在“文艺的当代性:改革开放三十年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精神

雷 达

这三十年,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到艺术世界,发生了梦幻般的巨变,用“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来形容也不为过。就文学来说,这三十年涌动过数不清的作品、口号、思潮和争论,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在不断转换,文学舞台上的主角也在不停地变幻,充满了曲折、起伏和跌宕。看来,情况已复杂到很难厘清和概括的程度。我们还有没有可能,面对新的历史语境,站在新的立足点上进行一些思考,比如,我们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与关联如何?等等。

在这里,我想仅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看这三十年文学的精神和变化。

一、艺术探索精神

这三十年间,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虽然有明显缺失,有泡沫,有诸多的不足和不满意,但是,整体地看,文学的人文内涵的广度,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的多种多样,汉语叙事潜能的挖掘和发扬,以及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的解放,作家队伍构成的丰富层次,特别是第四媒体——网络化带来的冲击,皆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有多少干扰,受多少限制,我们的文学在这三十年间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和壮大自己的过程,像是从狭窄的河床进入开阔的大江,较前大大成熟了、丰富了、独立了。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在我看来,有一种精神是很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

护文学的自由和独立的存在上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种努力保证了新时期文学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艺术技巧品位达到相应的高度。这里所谓的“文学自身”,可以视为对文学规律和审美精神的一种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甚至走向边缘化的情势下仍然活着,而且仍然不可替代地活着,顽强地活着,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纯粹的“文学自身”,她就像一位飘忽的女神,眼看快接近她了,伸手可及,她又飘然远去了,因为文学永远是现实的、具体的、个别的、变动不居的;只有裹挟了现实的风雷和历史的必然要求的文学,才是有力量的和回到了自身的文学,而“文学自身”作为一种境界,也只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延续她自身的生命。我们用不断回归不断游离再不断回归的复杂的过程来描述文学发展之路,也许是符合事实的。

回眸这三十年审美意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表达,它们是:启蒙、先锋、世俗化、日常化。三十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一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段:复苏期、繁荣期和1985年的转折期。这个阶段现实主义的回归、人道主义或人的文学、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成为主线。第二个时段包含了整个90年代,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商品化背景下的以世俗化和大众文化审美趣味扩展的文学。第三个阶段是指新世纪以来至今的文学。这个阶段是全球化、市场化、传媒化、信息化大大改变和影响了文学生产机制

的时期,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质素和新的特点。

在启蒙主义的大旗下,在“五四”传统的启迪下,“伤痕文学”曾是新时期文学潮流中奔涌的第一个浪头。“天安门诗抄”和最初的一批政治抒情诗,是最早对为极左政治服务的文学的反叛。诗人愤怒地控诉“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在今天看来,这些诗歌仍然是当代文学史上最沉重有力的铁的声音。“伤痕小说”正面描写“文革”留下的的心灵创伤,揭示个人或家庭的悲剧命运,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的牢笼,向现实主义传统回归。就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独立思考的、阅历丰富的作家,提供了一批更富理性精神也更有思想深度、在更大范围回溯和反省历史的作品。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出现。它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视野,增加了历史深度和思想容量,现实主义由此得以深化,种种禁区被冲毁,文学发挥了干预现实、干预灵魂的能动作用,开启了反思意识。嗣后,“改革文学”崛起,作家们纷纷将历史反思的目光转向沸腾的现实生活,着力表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改革中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心理结构的变化。另一部分作家则越过社会现实政治层面进入了历史的或地域文化的深处,对民族文化性格进行文学的或人类学的思考,引出了又一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80年代”就像一个紧张的思考者。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激荡中,1985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块界碑。文学打破了现实主义独尊的格局,呈现出多元发展势头,对原有的文学思维和观念进行清理、辨析,开展“方法论”大讨论。一部分作家从生存、叙事、语言等层面进行文学的实验,“先锋小说”在对启蒙理性解构的同时,试图提供一种新的真实观和对世界的解释,并崇尚“恶”的力量。“新写实文学”的兴起,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末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了,它因为对“先锋派”的反拨而兴起,收获不菲,终因平面化和原生态倾向而缺乏大的精神提升。

在这里,“先锋文学”的意义似乎值得单独一说。它不仅指马原、余华、苏童、残雪、格非、孙甘露等人开创的小说世界,同时也应该包括于坚、韩东、李亚伟等人的诗歌王国。韩东的《大雁塔》从宏大叙事模式格式化了的阅读中解放出来,还原了一个普通个体的真实。对于普通人来讲,登上大雁塔,不必像古人那样凭吊,发浩大的兴亡之叹,看看西安,再看看远处苍茫的景象,然后走下来,仅此而已。一种多么真实的感受。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像叙家常一样展开了他和朋友们的日常情态,李亚伟的《中文系》在

今天读来,似仍能闻到那间大学宿舍里的臭袜子味道。这些“先锋诗歌”意味着文学降落到人的最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了,或者说,撩开了观念的屏蔽,还原了个体人的日常真实。时至今日,“先锋文学”的成败得失仍然是文学界莫衷一是的话题。重估“先锋文学”是必须的。与人的命运一样,文学也不应以成败论英雄,而应该探讨它的价值。“先锋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精神即是如此。在文学与政治的拉力赛和异常尴尬的情景中,先锋作家们从“写什么”转换为“怎么写”,是一个进步和变奏。原先我们多以线性的思维来认识“必然和本质”,但“先锋文学”说,命运是非线性的,是偶然的,甚至是不可知的,不仅有一种命运,可能有多种命运。中国当代文学精神就这样从原来的总是质询时代的政治性主题和群体意识,转变为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探索,从集体的人指向了个体的人,人被从当下政治和种种社会环境制约下的现实的人转变为一种抽象的甚至摹拟的人。“先锋文学”后来遭遇质疑甚至冷落是必然的。对文本形式的迷恋和沉溺,空心化、抽象化、叙事的游戏化,使“先锋小说”与时代现实人心越来越远,成为读者身外的“冷风景”,不仅仅小说,诗歌也一样,文学精神在这片实验田里被技术之剑刺杀了。

整个90年代文学是在喧哗与骚动中结束的。小说界在不断地突围,诗歌界没有英雄。文学不但失去了轰动,而且失去了旗帜。随着80年代的终结,思想启蒙的声音在生活中和文学中都日渐衰弱,文学普遍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走向了世俗化和欲望化,一句话,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但是,这又恰恰是一个重新探讨文学精神的时代。80年代,文学是文化舞台的主角,90年代,文学差不多成了市场的弃儿。小说界和文化界的“人文精神”讨论,诗歌界的“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力量的博弈,都是对文学精神进一步认识的表现。这种认识使文学精神回到了原点,无论是否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人文精神,也无论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是否已经归来,但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新的文学需要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文学要为人人类创造一个精神信仰的王国和安顿灵魂的家园。

进入新世纪前后,文学开始分化,并显示了一些重要征兆。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文学逐渐把表现重心向都市转移。相对于茅盾的“阶级都市”、沈从文的“文明病都市”、张爱玲的“人性残酷都市”、老舍的“文化都市”,新世纪

文学的都市主要是倾情于物质化、欲望化、日常化的“世俗都市”。一个日常化的审美时期来临了。首先“亚乡土叙事”值得重视。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碰撞,从而产生了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当然不限于打工者,整个“底层写作”,作家们由最初的关注物质生存状态,转而关注其精神和灵魂状态。精神的贫困远比物质的贫困更为可怕。其次,人们不得不承认,青春与成长主题与“80后写作”一起,已悄然占据了文学的一席之地。再次是生态主题的萌蘖,由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对自身的生态问题并没有足够重视,致使生态破坏、自身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表象。以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系列、姜戎的《狼图腾》的部分描写、杨志军的《藏獒》等等作品为代表,文学开始深入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形态之间的关系。一批评论者不仅从西方生态思想汲取有益养分,而且开始发掘中国文化精神中的生态思想。虽然现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还没有在中国文学界形成大的气候,但它必将成为未来文学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生态哲学思想的兴起会广泛地影响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必然会深刻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要而言之,这三十年,在禁锢化与人性的解放之间,在欲望化与道德理想之间,在世俗化与崇高精神之间,在日常化与英雄情结之间,在城市化与现代性乡愁之间,文学在苦苦寻觅自己的理想形态和审美情神,这种寻求还将一直继续下去。

二、思想灵魂主线

这三十年,中国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灵魂的主线索?或者说,有没有它的主潮?有人认为无主潮、无主题,我却认为还是存在的。在我看来,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来看,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1980年,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让所有中国青年为之动容。“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说的不就是刚过去的十年浩劫吗?“红色大街”、“疯狂”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我”心灵的钥匙丢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诗人敏锐地道出了这种存在,并且“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

在认真思考”。这里,揭示一个时代存在的现状还不够,还需要寻找新的价值,还需要新的构建。

不独在诗歌,在“伤痕”、“反思”、“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里,作家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生存的深处、人性的敏感处、历史的内里,在寻找着“人”。与之相伴随的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人性、人的权利、人的尊严被不断重新提起和研究的时代。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弗洛姆、萨特、海德格尔、本雅明的思想被译介,它们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喧哗和回荡。莫言、张贤亮、刘恒、贾平凹、韩少功、李锐们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将我们带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文学世界,人性的复杂性在最低的生存中被打开,人与性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以一种紧张的甚至魔幻化的形态呈现出来。

事实上,寻找“人”和回答“人是什么”是新时期文学最根本的一个精神向度。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戴厚英的《人啊,人》。尽管现在看来,那时对人的认识多限于政治层面,但它开启了一个“人学”的寻找道路。“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在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与传统的中国伦理不同的新伦理。这种伦理首先就是崇尚爱情的价值。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只存在婚姻,不存在爱情。在80年代的文学中,爱情是一个超越其本身意义的大主题,是寻找“人”和发现“人”的一个重要场合。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朔的《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就死》,苏童的《离婚指南》,80年代的文学经过了对性的初次探索和对爱情与婚姻的质问,进入了90年代。从贾平凹的《废都》,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女性作家的涉性小说,我们看到,透过性对人性的探索变为一个最强烈、最集中、最尖锐的声音。

然而,必须看到,“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打着民族文化烙印的人。笔者在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时曾提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认为“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主线索,绝非笔者的玄想,而是众多作家呼吸领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焦灼地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的反映”。现在看来,这一归纳适用于对现当代文学的贯通。为什么不现实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人道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贯通性主线,而说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贯通性主线呢?乃是因为它不局限于某一种创作方法,也不

是哲学理念,而是更贴近作为人学的文学、更科学、也更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一种归纳。它是与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伟大民族精神复兴的主题紧密联系的。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承继晚清梁启超等人的“新民”主张,提出了“立人”思想,自觉地以“改造国民性”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鲁迅先生的这一追求,虽不能包容全体,却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显现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主导思想脉络。比如《阿Q正传》就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追求,阿Q遂成为共名。在对阿Q的阐释中,有人指出它表现了人类性的弱点,固然不无道理,但它首先是写出了中国的沉默国民的灵魂,写出了中国农民的非人的惨痛境遇,以及他们的不觉悟状态。“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没有中断,只是它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声浪的覆盖下以更隐蔽的形式潜在着。比如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实际上是对中国肩负着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因袭精神重担的农民形象的高度概括,他那谨小慎微、动摇、观望的矛盾心理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心态。这一形象即使在当时,也被有些人认为是最成功的,其魅力到今天也没有散失。到了新时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让人过目难忘,有人评论说,“陈奂生性格”是国民性格中美德与弱点的一面镜子。我们还可以从《原野》的仇虎到《红旗谱》的朱老忠再到《红高粱》的余占鳌,清楚地见到中国农民代代相传的英雄梦想和对原始强力的渴望。在诸多理想型的人物中,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嘉轩这一形象的文化意蕴颇为复杂,也很新颖,至少以前没有人这么直接把性格诉诸文化。他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但

他的人格却充满了沉郁的美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道德境界,东方化的人之理想。这里包含着作者对中华文化及其人格精神的观照与思考。在关于知识分子主题的作品中,其发展脉络同样曲折复杂,但贯穿性清晰可见。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这一叛逆者的疯言疯语,使我们感同身受一个“独战庸众”的个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有所发现的紧张,以及最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苍凉心境;在钱钟书的《围城》里,方鸿渐是个充满了自我矛盾的人物,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多余人”。在几十年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里,倪吾诚上演了另一出文化性格的悲剧,他向往西方文化,却无时不在传统文化的包围之中,被几个乖戾的女性折腾欲死,受虐而又虐人,忍受着无可解脱的痛苦。在杨绛的《洗澡》里有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弱点的解析;在宗璞《东藏记》里有对知识分子节操的追问,这些都是这一主题的延展。同时,我们在《活着》、《小鲍庄》、《日光流年》、《笨花》、《生死疲劳》、《玉米》里可以看到,其中既有对民族文化性格中的惰性因素的深刻挖掘,也有对其中的现代质素如执著、坚韧、顽强并将之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的大力弘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性决定“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主线索并不是单一的、静止的,它是一条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延伸的主线,它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对国民性的发现到对现代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深沉思考,从较狭窄的视角走向宏阔的文化视野,它将伴随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不断地深化下去。

①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作者单位 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大学文学院)

新时期文艺:风起云涌三十年

云 德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革,当代文艺同样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三十年间,文艺各领域全方位的探索创新和文艺各门类的佳作迭出,迎来当代文艺创作全面繁荣的新时期。其突出特点有三:

一是当代文艺同社会发展进程紧密相联,在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指原来创作方法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指文艺在与社会现实的有机联结中,作家对于社会生活